

后疫情时代不同语言习得环境下印尼汉语学习者拒绝 语用能力研究

Lia Angelina¹⁾; Wen Ting²⁾

¹人文学院, 慈育大学

²汉语学院, 北京语言大学

邮箱地址: langelina@bundamulia.ac.id; wenting@blcu.edu.cn

摘要

后疫情时代习得环境变得更为复杂。本研究以印尼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为研究对象, 将学习者分为第二语言习得环境(线上或线下的目的语国家语言环境)和外语习得环境(线下或线上的母语国家语言环境)两组, 采用口语语篇补全测试(ODCT)对两组学习者的拒绝语用能力进行考察, 其中语用能力分为五个维度: 交际功能、流利度、韵律、语言形式及得体性。研究结果显示, 两组学习者的拒绝语用能力在整体发展以及五个维度上均没有显著差异。结合质性访谈表明, 在后疫情时代, 是否处于目的语环境不是语用发展的决定因素, 无论是在第二语言习得环境下, 还是外语习得环境中, 语言和社会文化接触的数量和质量都会对语用的发展起到更关键的作用。

关键词: 后疫情时代; 第二语言习得环境; 外语习得环境; 语用能力; 拒绝言语行为

Abstract

The acquisition environment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has become more complex. In this study we takes Indonesian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learner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divides the learners into an onlin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nvironment (study in China, and learning Chinese online after returning home due to the epidemic) and an fore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environment (in a native country) Acquisition of Chinese) in the two groups, taking the refusal speech act in pragmatics as the entry point, and using the Oral 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 (ODCT) to examine the pragmatic competence of the two groups of Chinese learners. Pragmatic competence is divided into five aspects: communicative function, fluency, prosody, linguistic well-formedness of expression and appropriateness of express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overall perspective and five aspects of the refusal pragmatic compet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learners. Combined with qualitative interviews, it is shown that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The language acquisition environment is not a key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pragmatic competence. Whether it is a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nvironment or an fore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environment,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language and social culture contact will play a more critic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agmatics.

Keywords: *the post-epidemic era; th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nvironment; fore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environment; pragmatic competence; refusal speech act*

一 前言

学习者在不同的语言习得环境中获得第二语言，习得环境一般可以分为母语环境和目的语环境。有的学生一直在自己的母语国家学习外语，有的学生的习得环境则在变化中，如先开始在母语环境中学习，之后到目的语国家留学，随后又回到自己的母语国家。随着世界的国际化发展，学习环境不再单一，而是逐渐复杂、多变。2020年疫情突袭，进一步增加了语言环境的复杂性，如一些原本在中国学习汉语的留学生，回国休假后因为疫情未能返回中国，他们只能在线上继续每天的汉语课程，形成了通过线下、线上接受目的语国家语言教育的习得环境，与其相对的是通过线下、线上接受母语国家的外语教育。语言习得环境是影响语言获得的重要因素之一，后疫情时代我们暂时难以到目的语环境求学，在此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问（1）是否缺失了真实的目的语环境，语言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制约？（2）线下+线上的教学组织方式下，接受目的语国家和母语国家的语言教育孰优孰劣？

语言教学的目标是使用语言进行交际，除了需要掌握语音、词汇、语法的知识外，还需要语用能力。语用能力可以体现在言语行为中，如请求、拒绝、抱怨、建议、道歉等。我们在平时教学及本研究的访谈中都发现，表达拒绝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较为困难，第一是因为它属于威胁面子的行为，表达时需要让听话人理解同时又不会觉得难堪，母语者有时也难于出口，第二语言学习者更是如此，第二是因为中国人在表达拒绝时通常采用婉转的方式，这些方式汉语学习者常常掌握不足，因此表达时不知所措，或者表达得较为生硬刻板，甚至造成交际障碍。语用能力是语言能力的重要表现，鉴于拒绝言语行为的特殊性，我们可以将其作为切入点，考察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语用能力的发展。

鉴于后疫情时代语言习得环境的新变化，以及学习者语用能力的重要性，本研究将以高级水平的印尼汉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将学习者分为第二语言习得环境和外语习得环境两组，前者中的学习者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接受目的语国家的语言教育，后者中的学习者通过线下或线上的方式接受母语国家的外语教育。研究将通过口语语篇补全测试（ODCT）收集学习者的拒绝言语行为语料，在考察学习者总体语用能力同时，采用分立式评分标准，进一步从交际功能、流利度、韵律、语言形式、得体性五个维度进行评分，考察后疫情时代第二语言习得环境和外语习得环境对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拒绝语用能力的影响，结合访谈对后疫情时代不同语言习得环境中的重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二 理论基础

2.1 语言习得环境与语用能力发展

学界根据语言习得环境的不同,区分了第二语言习得和外语习得两个概念,前者发生在目的语国家,后者发生在非目的语国家。随着海外学习(Study Abroad)研究的兴盛,以往习得环境的研究也更关注第二语言习得环境。多数学者认为,第二语言习得环境更有利于语用能力发展,因为目的语环境可以让学习者的语言表达更加符合当地的社会文化特点(Taguchi & Roever, 2017)。Bardovi-Harlig 和 Hartford (1993) 的研究表明,在目的语国家留学一学期后,学习者在建议和拒绝言语行为方面的表达更加符合母语者的表达方式(任伟, 2019; Ren, 2013)。Barron (2000) 也发现随着留学时间的延长,缓和语的使用频率逐渐提高,表达更加符合母语者的方式。Felix-Brasdefer (2004) 的研究表明在目的语国家居住时间越长,二语学习者使用的词汇和句法手段更多,减轻了拒绝言语行为对听话者面子产生的威胁。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研究中,应洁琼(2018)通过语篇补全测试、访谈和观察对6名在华留学生的请求言语行为语用能力发展进行了调查,发现学习者在语言层面和请求策略上的误用减少,在表达上越来越趋近汉语母语者。肖峰、史中琦(2014)调查了16名在中国学习6周的美国汉语学习者使用汉语协商策略的情况,他们分别在第1周和第6周完成了角色扮演,研究发现在6周的海外学习中,学习者在服务性场景中使用协商策略的次数增加,表达方式逐步向着母语者的标准靠拢。

以上研究说明目的语国家的语言习得环境有利于语用能力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研究呈现出了不同的观点。Niezgoda 和 Roever (2001) 提出没有海外学习经历的英语学习者的语用意识更强,这可能与被试的学习动机有关(Taguchi & Roever, 2017)。杨黎(2015)通过语篇补全测试考察了语言环境对不同水平的美国汉语学习者的感谢言语行为语用能力,研究发现学习者的语用能力并没有随着在目的语环境居住时间的增加而显著提高。任伟(2019)通过角色扮演考察了55名在华留学生的请求语用能力,探讨了在华留学时间长短对语用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二者之间并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通过对以往研究的回顾,我们发现目的语的环境有利于学习者语用能力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海外学习并非必然带来语用能力的发展,学习者角度的态度、动机,语言习得环境中实际的语言和社会文化接触的质量等其他因素可能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2.2 拒绝言语行为研究

拒绝言语行为与请求、道歉等其他言语行为有较大的不同，是高风险的、具有威胁性的行为，因为与说话对象的期望相矛盾（Allami & Naeimi, 2011）。因此，人们在实施拒绝时要考虑礼貌问题，采用一些策略来减缓对面子的威胁（唐玲，2004）。此外，无论是表达还是接受拒绝，采用策略和技巧的同时，还需要理解言语行为包含的社会文化因素，拒绝言语行为才能得体地实施。（付亮、古丽米拉·阿不来提，2015）

在拒绝言语行为的研究中，从早期到现在较多研究是从跨文化视角出发，对不同国家母语者的拒绝言语行为进行比较（Beebe, Takahashi & Uliss-Weltz, 1990），有关汉语与其他语言的研究以英汉对比为主，如 Liao & Bresnahan（1996）马月兰（2000）均发现，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倾向于用客观辅助行为语，而美国人偏向于使用主观辅助行为语和直接拒绝的表达方式。从研究内容的发展看，拒绝言语行为的研究范畴不断丰富。早年较为集中在对学习者的拒绝策略、语义序列及其频率等方面的探讨，之后不断扩展，如关注得体度、产出时间、语速和停顿时间（Lee, 2013）、学习者所产出的缓和标记语（Bella, 2014），语言与社会接触对拒绝言语行为的理解和产出的影响（李嘉力，2019）等。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大部分学者使用的是书面语篇补全测试，也有少数学者使用多媒体情景任务（Multimedia Elicitation Tasks）、角色扮演（Role-play）、采访等方法。在拒绝情景设计中，有的研究会考虑到交际双方的社会权势、社会距离和拒绝引发行为的强加度，但是大部分研究仅考虑其中的一两个因素，其中对社会权势因素的关注更多。

由于疫情的关系，传统的线下课堂教学迅速转移到了线上，从语言习得环境的定义看，第二语言习得环境和外语习得环境都发生了改变。本文中的第二语言习得环境既包括置身于目的语国家，也包括在线接受目的语国家的语言教育，外语习得包括线下、线上两种方式，但都是接受母语国家的语言教育。这两种习得环境哪一种更具有优势？我们对两种习得环境下的汉语学习者的语用能力进行考察，探索环境对语用能力的影响，以及在习得环境中促进语用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 研究方法

3.1 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采用定量研究方法，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式统计语言习得环境对拒

绝语用能力的影响，自变量为被试间变量，分为第二语言习得环境、外语习得环境两个水平，因变量为学习者的拒绝语用能力。Li, S.等人（2021）¹在研究语用测试时，将语用能力分为交际功能、流利度、韵律、语言形式、得体性五个维度，本研究也将具体考察习得环境以及五个分项维度上的影响。

3.2 研究对象

本研究共有 30 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在第二语言习得环境、外语习得环境中学习的被试各 15 名，其中线上第二语言环境下的学习者在疫情前就读于中国各地高校一年半，2020 年因疫情回到印尼，之后的两个学期在线上选修中国高校课程。外语习得环境中的学习者没有在华留学经历，一直在印尼本地学习汉语，有 8 位学习者没有线上教学的经历，另外 7 名学习者在线上学习时间约为一学期。两组被试均已通过 HSK 5 级考试。

3.3 研究材料

本研究采用口语语篇补全测试（ODCT）收集汉语学习者的语料。在情景设计中，我们首先对拒绝引发行为做出选择，根据 Beebe 等人（1990）的研究，拒绝引发行为可分为 4 种：请求、邀请、帮助以及建议，但是我们通过研究前的小调查发现，印尼汉语学习者普遍认为拒绝别人的请求、邀请和建议是最难的，因此本文就此三种拒绝引发行为设计了情景。其次，本研究在设计情景时也考虑到交际双方的社会距离、并且对社会权势和强加度（The Rank of Imposition）进行一定的控制。根据杨黎（2015）的研究，社会距离指的是交际双方的亲密程度，可分为“亲属关系”“熟识关系”“相识关系”和“陌生关系”，在本研究的情景设置中分别用“父母”“好朋友”“同学”“陌生人”代表。本文使用的口语语篇补全测试（ODCT）共有 12 种情景（详见附录）。

传统的口语语篇补全一般为面对面的交流，受到疫情的影响，我们通过微信、Line 等软件把口语补全测试的 PDF 文件发给被试，被试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自行录音，最后再把录音文件发回。口语语篇补全测试先向被试详细介绍参与测试方法，之后提供语用情景描述。在情景描述部分，我们向被试提供一个详细的拒绝情景描述，要求被试在仔细阅读所有情景之后，自行录下自己的真实反应，其作答时间（录音时间）不限。为了减少印尼汉语学习者理解情景的难度，本文采用的口语语篇补全测试的内容为汉语、印

¹ Li, S., Wen, T., Li, X., Feng, Y., & Lin, C. Comparing holistic and analytic marking methods in assessing speech act production in L2 Chines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尼语双语种文本。此外，我们也通过 Google Forms 请被试填写一份电子版问卷，收集被试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年龄、性别、母语、是否为华裔、HSK 水平、学习汉语时长、语言使用情况及联系方式。

3.4 拒绝语用能力评分方法

为了评判印尼汉语学习者的拒绝语用能力，我们请四位汉语母语者作为评分员，对被试在口语语篇补全测试（ODCT）中的回答打分。这四位评分员均为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在读研究生，对第二语言学习者语用研究有一定的了解。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部分研究者关注学习者言语行为的得体性，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学习者表达的交际功能、语言形式和得体性，但采用的评分表是把这三个维度整合起来，从整体上进行评分，可能会忽略学习者在三个维度上的具体表现。为了对学习者的语用能力的总体水平以及不同的维度进行评判，本文采用 Li, S.等人（2021）制定的分立式评分表，评分表的总体信度为 0.95。该评分表为四分制的评分表，分别从五个维度进行评分，其中包括交际功能、流利度、韵律、语言形式及得体性。每个维度都有不同的评分层面，交际功能维度主要从学习者的表达是否能够实现拒绝意图来评分，流利度维度是从学习者的表达是否存在停顿现象来看，韵律维度是对学习者表达的语调和重音进行评分，语言形式维度主要从语音、词汇和语法来评分，而得体性维度则是对学习者在表达拒绝时的正式程度、直接程度和礼貌程度进行的评分。

为了确保四位评分员在评分标准上的一致性，正式开始评分之前，我们通过 Zoom 平台对评分员进行了三次培训。在第一次培训中，我们邀请了专业的教师，也是参与以上评分表的制定者进行指导。在教师指导下，四位评分员一同对三个被试的录音进行评分，随之对每道题的评分展开详细的讨论。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培训中，我们先给四位评分员发放了五个被试的录音，让评分员在规定时间内自行进行评分，在此期间评分员之间不得互相讨论。之后我们在当天展开讨论。对评分差异较大且不能通过讨论消除争议的语料，请教专业教师后进行讨论及重新评分。对于评分员的培训确保了对学习者拒绝言语行为的科学评判。

3.5 数据分析

在数据处理上，我们会以 4 位评分员对每一道题、每一个维度的平均数为最小计算单位。体现学习者拒绝表达能力的数值主要有两类：一是拒绝语用能力在五个维度上的体现，数值上体现为每个维度的平均数加合（分项语用能力平均数加合），二是拒绝语

用能力的总体水平，数值上整体语用能力平均数加合。

分项语用能力平均数加合将有 5 个数值，分别是交际功能平均数加合、流利度平均数加合、韵律平均数加合、语言形式平均数加合、得体性平均数加合。每个维度平均数加合的满分是 48 分（4 分*12 道题）。以交际功能维度为例，更详细的计算公式如下：

整体语用能力平均数加合为 5 个分项语用能力平均数加合的总分，因此满分是 240 分，更详细的计算公式如下：

交际功能平均数加合= 题目 1 交际功能平均数+题目 2 交际功能平均数+题目 3 交际功能平均数+……+题目 12 交际功能平均数

整体语用能力平均数加合= 交际功能平均数加合+流利度平均数加合+韵律平均数加合+语言形式平均数加合+得体性平均数加合

四 研究内容及成果

4.1 语言习得环境与拒绝语用能力总体水平的研究结果

以语言习得环境为自变量，以拒绝语用能力总体水平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语言习得环境主效应不显著（ $F(2, 42) = 2.882, P = .101$ ），说明习得环境对拒绝语用能力总体水平没有显著的影响。结合两组被试在总体水平上的平均数，在两种环境下，拒绝语用能力的总体水平没有明显的差异。

表 4.1 两组学习者拒绝语用能力总体水平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语言习得环境	拒绝语用能力总体水平
第二语言习得环境	220.02 (8.36)
外语习得环境	226.62 (6.34)

4.2 习得环境与拒绝语用能力不同维度的研究结果

以语言习得环境为自变量，以拒绝语用能力在五个维度上的水平分别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从交际功能、流利度、韵律、语言形式、得体性上看，语言习得环境的主效应均不显著。（ $F_{\text{交际功能}}(1, 24) = .066, P = .799$ ； $F_{\text{流利度}}(1, 24) = 3.717, P = .064$ ； $F_{\text{韵律}}(1, 28) = 2.568, P = .120$ ； $F_{\text{语言形式}}(1, 28) = 1.045, P = .315$ ； $F_{\text{得体性}}(1,$

28) = 0.059, P= .810)。说明从拒绝语用能力的不同维度上，习得环境对拒绝语用能力也没有显著的影响，在两种环境下拒绝言语行为在交际功能、流利度、韵律、语言形式、得体性上均没有明显的差异。此外，结合描述性统计，我们看到，虽然平均数的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但是在具体的数值上，外语习得环境中的学习者在五个维度上都略优于第二语言习得环境中的学习者，与总体结果相似。

表 4.2 两组学习者拒绝言语行为语用能力不同维度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语言习得环境	交际功能	流利度	韵律	语言形式	得体性
第二语言习得环境	47.1500 (1.28104)	44.2167 (3.38836)	44.5833 (2.67206)	42.3167 (3.02293)	43.7500 (1.24642)
外语习得环境	47.2500 (.79057)	46.1667 (1.96548)	45.9500 (1.94156)	43.3833 (2.68239)	43.8667 (1.38508)

结合 4.1 及 4.2 的研究结果，主要有以下初步结果：

无论是拒绝语用能力的总体水平，还是从交际功能、流利度、韵律、语言形式、得体性，习得环境对拒绝语用能力均没有显著的影响，在线上兼线下教学方式下，比较第二语言习得环境和外语习得环境，在对拒绝语用能力的影响上，两种环境没有显著的差异，在具体的影响数据上，略微有所不同，即外语习得环境在总体及五个维度上略优于第二语言习得环境。

4.3 讨论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无论从语用能力的总体发展，还是从交际功能、流利度、韵律、语言形式和得体性五个维度的发展上看，在后疫情时代，线上兼具线下的第二语言习得环境与外语习得环境中，学习者在语用发展上并没有显著性的差异，而且从平均数来看，后者的语用发展水平甚至略高于前者。在传统教学状态下，虽然有研究表明，在非目的语国家学习仍可以提高其语用能力 (Ren, 2013)，但是大部分研究的结果支持目的语环境对语用发展的积极作用，因为在目的语环境中，学习者平时能够与母语者更充分地交流，也能更多地接触目的语文化，促使语言表达更加符合当地的社会文化 (Taguchi &

Roever, 2017)。

由此可见,本研究与以上大部分研究结果是相悖的,这也表明在如今的后疫情时代,语言环境的特点发生了变化,语用能力发展也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中的两组学习者组内的影响因素也有各自的特点,下面我们结合质性访谈、调查问卷分别探讨其因素。

第一、在第一组学习者(线下+线上第二语言习得环境下的学习者)的质性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与语用发展相关的三个方面,即语言输出与输入、学习者的社会文化接触、留学时长及语言保持情况。

在语言的输入和输出上,学习者在华留学时、回到印尼后的汉语使用情况比率有所不同。根据统计,在华期间汉语使用比率约占每日话语量的73%,回到印尼后约为27%,相比真实的线下环境,在线上语言环境下,汉语的使用比率大量减少。在语言输入上,克拉申的“输入假说”强调,语言习得要通过接受可理解输入才能发生。在目的语国家学习时,学习者能获得可理解输入的机会较多,他们不仅可以在课堂内听到汉语,而且他们生活在目的语社会中,在日常生活中与汉语母语者接触,每天听到的、看到的都是汉语,因此在课堂外他们仍然能获得很多的汉语输入。在线上环境下,除了在线课堂学习的时间以外,学习者接触汉语的机会较少,有的学习者可能会给自己创造语言环境增加汉语的输入,如看中文电影或者电视剧、使用中国社交媒体软件、看中文报纸等,但其效果远不如学习者真正在目的语社会中生活和学习。从语言输出上看,线上教学方式很难实现大量的课堂互动,也会导致学生语言输出的减少。

此外,Taguchi等人(2016)也在研究中发现社会文化接触对语用能力发展其实是有直接的影响,这里的社会接触指的就是学习者在不同社会活动下使用语言的强度。在目的语环境学习时,学习者在日常生活中都能有机会接触到母语者。在线上第二语言习得环境中,学习者除了上课时间以外,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与汉语母语者进行交流的机会很少,社会接触程度明显减弱,语用能力的发展也因此而缓慢。

这些跟如今线上语言习得环境有关,但另一方面,在第一组学习者中,有的曾在真实的第二语言语言习得环境中学习生活过一段时间,但他们的语用发展仍然没有体现出优势,这与任伟(2019)的研究相符,该研究表明在目的语国家待了平均两年多的被试,汉语语用能力也没有明显发展。除此之外,参与本调查的学习者有的已经离开目的语国家约一年的时间,因此也会存在语用能力停滞或者下降的问题。

第二、在第二组学习者（通过线下和线上接受目的语国家语言教育的学习者）的质性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他们在语言输出与输入、学校环境（师资、教材）上的特点，这让没有留学经历的学习者也可以获得很好的语用能力发展。

首先在汉语使用比率的调查中，外语学习者环境中的学习者，汉语使用比率约为44%，虽然低于在目的语国家学习生活的比率，但是高于线上第二语言习得环境下的情况。我们对他们进行简单采访后发现，其中有14名学习者在疫情下依然继续从事跟汉语相关的工作，比如在汉语补习班当老师、在中国企业当翻译、兼职当汉语家教等，增加了汉语的输入与输出。

第二，我们发现外语环境也可以提供优质的目的语。本研究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印尼的慈育大学，在汉语教学师资上，该系每年聘请中国教师任教，本土教师也均有来华留学的经历。在课堂内外，为了给学生创造良好的语言环境，师生间尽量不使用印尼语，课下通过聊天软件与教师交流时，学生一般也会使用汉语。此外，在对该校的教师进行访谈时，教师们表示会注意学生的语用问题，向学生解释基本的礼貌用语，比如跟教师或者长辈需要用“您”代替“你”，还有提出问题的时候要说“请”等等。在访谈中学生也提到教师对于礼貌用语的关注，有学生提到教师结合学习内容分析了“好的”和“好吧”在语气上的区别。从学习者使用的教材来看，印尼慈育大学中文系大量使用中国出版的教材，而非本土教材，因此在学习者内容上与在目的语国家的学习者没有很大的差异。良好的师资、教学中对语用的关注、选用目的语国家的教学资料，都促进了学习者语用能力的发展，弥补了缺乏真实目的语环境的不足。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定量研究的结果反映了后疫情时代语言习得环境的特点，说明真实的第二语言环境与线上第二语言环境的不同，也证明外语学习环境并非一定不如第二语言习得环境。

五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后疫情时代第二语言习得环境以及外语学习环境的变化，前者可以定义为通过线下或者线上的方式接受目的语国家的第二语言教育，后者为在线下或者线上接受母语国家的第二语言教育。我们以高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以定量研究为主，质性调查及访谈为辅，考察了两种环境对学习者的语用发展的影响，比较了两种环境下汉语学习者的拒绝言语行为表达能力。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 无论是从语用能力的整体发展水平上, 还是交际功能、流利度、韵律、语言形式、得体性五个维度上, 语言环境对语用能力均没有显著的影响, 第二语言习得环境下的学习者与外语学习环境下的学习者在拒绝言语行为的表达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2) 语言环境是影响语用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同时学习者语用能力发展也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无论是第二语言习得环境还是外语学习环境, 线上或者线下的教学方式, 语言的接触(目的语的输入、输出、互动)以及社会文化的接触, 都是促进语用发展的重要因素。提高语言接触、社会文化接触的量与质, 是语用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中文期刊论文

- 付亮、古丽米拉·阿不来提(2015)国内外拒绝言语行为研究综述,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第12期。
- 马月兰(2000)中美拒绝语策略共性比较研究,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第2期。
- 唐玲. 汉语间接拒绝言语行为的表层策略分析, 《广西社会科学》第10期。
- 任伟(2019)出国语境下国际学生汉语语用能力研究, 《外语与外语教学》第2期。
- 肖峰、史中琦(2014)目的语环境中协商策略的发展, 《世界华文教育》第2期。
- 杨黎(2015)目的语环境中美国留学生汉语感谢言语行为的习得, 《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应洁琼(2018)基于语言社会化理论的留学生汉语语用能力发展研究,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
- 李嘉力(2019)泰国小学阶段华裔与非华裔汉语学习者拒绝言语行为的社会化历程研究,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Taguchi, Naoko & Roever. Carste (2017) *Second Language Pragma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llami, Hamid & Naeimi, Amin (2011) A cross-linguistic study of refusals: An analysis of pragmatic competence development in Iranian EFL Learners. *Journal of Pragmatics*,43(1),385-406.
- Barron, Anne (2000) Acquiring 'different stroke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2 pragmatic competence. *German as a Foreign Language Journal*,2,1-29.
- Bella,Spyridoula (2014) Developing the ability to refuse: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Greek FL refusals. *Journal of Pragmatics*,61, 35-62.
- Félix-Brasdefer, J.C.(2004) Interlanguage refusals: Linguistic politeness and length of residence in the target community. *Language Learning*,54,587-653.

Li, S., Wen, T., Li, X., Feng, Y., & Lin, C . Comparing holistic and analytic marking methods in assessing speech act production in L2 Chines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Lee, Hanjung (2013)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ituations on fluency difficulty in Korean EFL learners' oral refusals. *Journal of Pragmatics*,50(1),168-186.

Liao, Chao-chi and Bresnahan, Mary I (1996) A contrastive pragmatic study on American English and Mandarin in refusal strategies. *Language Science*,18,703-727.

Ren, Wei (2013) The effect of study abroad on the pragmatic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l modification of refusals. *Pragmatics*,23,715-741.

Beebe, Leslie, Tomoko Takahashi & Robin Uliss-Weltz (1990) Pragmatic transfer in ESL refusals. In Robin Scarcella, Elaine Andersen, and Stephen Krashen (eds.), *Developing Communicative*, 55-73. Cambridge: Newbury House.